



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公共行政论丛

rendexuyao yuzhuanxing shiqide
gonggongzhengcexingweiyanjiu

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

公共政策行为研究

张
晓
峰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
公共政策行为研究”项目负责人。（项目批准号：08JA810007）



黑龙江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公共行政论丛

主 编 何 颖

副主编 教军章 陈 辉

张晓峰

张晓峰 著

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 公共政策行为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张晓峰
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5
ISBN 978-7-207-09375-5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需要—理论研究 IV.
①B8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7642 号

责任编辑:安晓峰 孙国志
装帧设计:李 梅

人的需要与转型时期的公共政策行为研究

张晓峰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374-5
定 价 40.00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总序

百余年来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给予我们诸多的启示,这些启示既体现在关于公共行政本质内蕴的终极诉求中,因而出现了有关行政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多维向度及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深度思考,形成了被权威学者称之为“丛林”的理论流派的长期分野乃至交锋;也体现在归依于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视野内的众多研究领域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扩张,从而形成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系统的分支网络,沿着这些分支系统深入下去就又构成公共行政研究的各自独特限域与方法体系。理论的研究是一种反思与创新的过程。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不仅以人类的行政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同时也以人类关于行政实践活动的认识过程——以往的公共行政理论——为其研究对象,从而使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成为反思公共行政行为与思想的逻辑体系,使其具有广泛的解释性与超前的引领性,因而也更接近现实并对现实更具批判性与指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就不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且更是“改变世界”的理论,这对于我们探索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理论演进的理路,显然是值得深而思之的问题。

然而,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并非是脱离行政实践的、纯粹的形上沉思,而是以更为现实的理论范式来展现理论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并因此而累积学术传承的历史性与独特性。纵观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历史进程人们可以发现,从最早的政治与行政的二分理论到科学管理理论、官僚制理论,经由人际关系学说与需求理论为基础形成的行为科学理论,再通过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的奠基而重新唤起对公共行政问题的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等基础性解读,之后又出现了以公共选择理论、制度

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无一不是面对当时的公共行政实践问题提出的解题范式。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就是这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更迭与理论的积淀,为行政管理实践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指导,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对公共行政理论研究过程中,面对变动不居的行政现实,人们在不断领悟公共行政之精神,研求行政公共性诸表征,总结公共行政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探寻公共行政之方式与方法,并伴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公共行政的需要,来构建能够为现实提供积极服务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理论。由此可见,为现实需要服务始终是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恒久不易的宗旨。

人们对公共行政理论探究的本质在于不断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从而挖掘和寻求可资借鉴并具指导意义的思想与方法。从这个意义讲,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领域是开放的,研究的内容是现实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体现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也应是“事实”与“价值”的高度整合,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以理性的分析方法来总结具有规律性的公共行政的本质、价值、原则与理念,来梳理公共行政过程中工具性与价值性、目的性与道义性、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权利与权力、主体与行为、方式与方法、行政职能与权力规制、制度设计与安排、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等基本关系;来探究有关公共行政主体的整体与个体的区分所形成的关于公共行政组织、公共人事行政、行政领导学等的研究体系。对公共行政进行哲学层面的理性思索则涉猎了对公共行政的本质性、公共性、公共精神等一般性问题的研究及对行政价值、行政伦理、行政发展、行政方法等问题的深度研究。因此,无论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层面来审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所涉猎的基本问题都需要进行一番深入研讨,而且理论研究的传统确实也给我们今天的创造性阐释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我们以为对公共行政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尤显必要,于是便策划了“公共行政论丛”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以黑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科支撑的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核心学术团队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整体上进行了逻辑设计,对公共行政基础理论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价值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创新性解读,一方面为公共行政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另一方面在展示研究中心学术团队多年研究成果的同时也为其研究方向

作一引导,将问题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丛书将重点从两个层面展示研究成果:一是关于公共行政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目的在于全面梳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成就,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度探勘,进一步揭示其理论价值,以便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二是关于公共行政理论的实践应用问题研究,目的在于重新透视公共行政基础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特别对中国公共行政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作深层的研究,以为解决中国公共行政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参照。

这套丛书还仅仅是我们从事公共行政问题系统研究的初步尝试。尽管我们苛求严肃精致的学术研究品位,本着科学的态度和钻研问题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科学研究视角和创新的研究方法,但是像人类所有的理性思维与其具体的符号表达总存有差距一样,本丛书肯定存在着一些不足,作为一种学术讨论的基本形式,我们期待得到广大学术同仁的批评和斧正,这是对我们学术研究的最大鞭策!

“公共行政论丛”编委会
2005年2月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导 言	(1)
一、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人性视角下政策行为 与社会转型的交互影响	(1)
二、社会转型是现代化意义上需要的运动和变化在政策发展上 的反映	(7)
三、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行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对社会价值 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	(15)
第一章 人的问题: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	(23)
一、现实的人: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23)
二、人的生存发展与公共政策的人性关怀	(25)
(一) 公共政策是以解决人的问题为己任的	(25)
(二) 公共政策是人的存在方式的体现和实现形式	(28)
(三) 公共政策问题是与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社会公共问题	(30)
三、人与发展:走向深层意义的公共政策研究	(32)
(一) 对发展的认识:由思辨到实践	(32)
(二) 恶性发展:政策异化与人的异化	(33)
(三) 公共政策的价值定位:以人为本的综合发展观	(35)
第二章 人的需要:政策行为的内在动因	(39)
一、人的需要的满足:政策活动的基本动力	(39)
二、源于需要的利益关系调节:公共政策的基本功能	(42)

(一)利益: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意向	(42)
(二)基于需要的各种利益关系及利益冲突	(44)
(三)利益诉求与利益实现	(48)
(四)政策:利益的体现和满足需要的主要途径	(48)
三、价值的实现即需要的满足:政策的价值分配功能	(50)
四、需求、偏好、效用: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指向	(52)
第三章 人性视阈下的需要与政策:理论梳理与交互影响	(55)
一、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需要问题:欲与理问题上的政策悖论	(55)
(一)“欲”与“利”:“道治”的政治统治规律	(55)
(二)“欲”与“爱”:“仁治”的政治统治伦理	(57)
(三)“欲”与“术”:“法治”的政治统治原则	(58)
(四)“欲”与“予”:“善治”的政治统治方略	(59)
(五)“欲”与“天”:“人治”的政治统治依据	(60)
(六)“欲”与“理”:“礼治”的政治统治规范	(60)
二、西方需要理论的历史演进与政策实践	(62)
(一)欲望、道德与理性	(63)
(二)禁欲、虚伪与人道	(65)
(三)爱:欲望的利己性与利他性	(66)
(四)对理性独断的超越:现代人本主义对欲望的高扬	(68)
(五)从“动机”、“需要”到“行为”:关于驱动力的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研究	(70)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需要问题的论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79)
(一)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实践意义上的诠释	(79)
(二)满足基本需要的实际过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与效用	(80)

(三) 需要与劳动:资本的贪婪与劳动的异化	(82)
(四) 需要与国家、社会:未来理想社会与人的解放	(83)
第四章 需要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政策是满足需要的行为依据	(85)
一、需要的生成:基于人与世界对象性关系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85)
(一) 需要的生成与人的生命活动	(85)
(二) 需要的生成与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	(86)
(三) 需要与情感、意志、直觉、灵感在人类活动中的交互作用	(88)
二、需要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	(89)
(一) 需要是社会产生的动力源	(89)
(二) 需要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行为的内在尺度	(90)
(三) 需要是社会发展规律形成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92)
三、政策是人类对社会认识的结果和满足需要的行为依据	(95)
(一) 政策:满足人们需要的政治治理工具和手段	(95)
(二) 需要基础上政策与历史的交互作用	(97)
(三) 政策对需要的满足体现着社会发展规律与政策运行规律的相互作用	(105)
第五章 社会转型:政策推动下满足需要方式的社会变革	(107)
一、社会转型:需要的运动和变化在政策发展上的反映	(107)
(一) 社会转型的内在动因:现代化需要对政府政策行为的挑战	(107)
(二) 社会转型是需要展开和实现过程	(113)
(三) 全球化:基于人类共同需要的更深层社会转型	(120)
二、从无序到有序的社会变革:政策对需要变化的回应和发展	(124)

(一) 社会发展进程的转折:发展范式上需要满足方式的转换	(124)
(二) 社会转型时期政策的变动性与人们需要及行为的非预期性	(130)
(三) 需要的嬗变: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决策的模糊性	(134)
第六章:社会转型与需要转型:政策满足需要的方式的转型	(140)
一、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需要的变化与社会心理	(140)
(一) 变革的需要及畸变	(140)
(二) 需要的焦虑及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	(150)
二、需要变化引起的利益格局变化对政府政策的挑战	(154)
三、需要整合基础上利益关系的均衡:政策满足需要的基本手段	(161)
第七章 社会转型时期需要与政策运行过程的互动	(171)
一、社会转型时期政策环境的复杂性:系统开放情境下需要与支持的相互转化	(171)
二、因需而多变: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决策的超常性	(180)
三、社会转型时期政策决策的实效性:政策与需要的交互作用	(186)
(一) 需要与政策活动的启动	(187)
(二) 需要与政策活动的逐步展开	(189)
(三) 需要与政策活动的调控、纠偏和创新	(190)
第八章 社会转型时期变革政策的行为模式:注重实际需要的政治智慧	(195)
一、社会转型时期需要的现实性:非模式化的政策艺术	(195)
二、社会转型时期变革政策的行为基础:源于需要的行为动机	(206)
三、社会转型时期变革政策的内在动力与压力:灵活稳健的政策策略	(212)

第九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冲突及政策对需要的调节	(220)
一、社会转型是由冲突相伴始终的非平衡发展过程	(220)
(一) 社会转型时期冲突的必然性:在矛盾与互补中曲折前行	(220)
(二) 社会转型时期冲突的特点:需要的不容导致的利益冲突 的主导性	(223)
二、社会转型时期人们需要的矛盾与利益、价值的博弈:变革 时代社会冲突的心理机制与政策价值导向	(225)
三、从满足和调节人们的需要入手化解冲突:斗争与和谐的辩证法	(230)
四、矛盾、冲突、实践与需要的满足:社会转型时期的政策标准	(233)
第十章 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统治需要与人性问题:政策行为的两 难选择	(239)
一、作为目的与手段的权力:社会转型时期体现政策活动中政治 关系的需要满足形式	(239)
(一) 权力与政策活动中人的行为:社会转型时期领导与服从 的需要	(239)
(二) 政治权力对转型时期政策活动的影响:需要基础上权力 行使者与权力承受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246)
二、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权力主导下的政策变迁与政府需要的满足	(251)
(一)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需要的扭曲及权力运用上的悖论	(251)
(二)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权力格局变化对政府政治合法性 需要满足的影响	(256)
(三)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权力运行方式在政策上的变化:政府 职能的转变	(259)

三、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社会转型时期政策满足 政治统治需要的主要途径	(263)
四、社会转型时期政策活动中的权力需要与人性问题:弃恶 扬善和对权力弊病的克服	(266)
第十一章 社会转型时期政策行为的结果:需要互惠基础上的 利益共享	(270)
一、人类有限理性与社会交换中的互惠效应:社会转型时期政策 对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依据	(270)
二、社会转型时期基于需要互惠的政策行为	(275)
(一)公共需要的满足: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的本质与核心	(275)
(二)“善治”意义上各政策行为主体彼此需要上的互惠 ...	(281)
三、公共利益基础上政策对个体欲望的调节与利益共享	(291)
参考文献	(300)
后 记	(310)

导 言

一、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人性视角下政策行为与社会转型的交互影响

社会转型的过程是全球化过程中人的生存、发展朝着新的社会发展阶段转换和跃迁的动态演进过程，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的转型在政府公共政策行为上的表现，离不开政府社会变革政策的引领和促动，而且这种引领和促动都是与人们的需要及其满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人们的需要及其满足贯穿始终，并以此作为结果和评价标准的。尤其在全球化中，这种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已经超出民族、国家和地域的界线，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交往与合作中彼此不断交织与融合，形成共同需要基础上的人类共同命运，促成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多元共生格局的出现，进而从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首先，当代的全球化促成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完成，从而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主体条件，并因此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可能。其次，当代的全球化带来了各种全球性问题，从而以否定的形式为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了内在的动因，并因此使人类的共同利益成为现实。”^①“人类共同利益”使得任何国家都不能够离开其他国家而单独生存下去，每一个国家在经济、生态乃至领土安全方面都要依赖其他共同体和国家，跨国公司、跨区域共同体、跨国联盟，跨国界及跨地区发达的交通、互联网的普及，世界范围内社会

^① 汪信砚：《全球化与人类共同利益》，转载于袁祖社《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6页。

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日益趋于公共化。生存需要的公共性将多元差异的生存主体连接在一起,通过沟通、协商、对话结成公共空间,使任何“偶然的个人”生存不断被共同性的“有个性的个人”的生存所取代。可见,全球化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类在更高层次上全面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成为可能。

社会转型过程对传统国家来说是一个走向市场化和赶超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而对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则是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使之进一步适应全球化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争先地迈向更高程度现代化的过程。按照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市场中的人都是理性的、带有“自利性”的“经济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市场又是如T·伯恩斯所言的“一个无结构的无序整体”,“无形的手”在其中自发地产生作用,“在市场上,个人之间相互交换以追求个人所得为目标。个人和市场都被看成是理性的——同时都缺乏道德考虑,个人和市场抽象于具体的社会条件,超越社会与文化之外。”^①人的“自利性”源于人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的一种表现和内在心理反应。亚当·斯密在阐述人的“自利性假设”时指出,人具有双重本性,即自利性(*selfinterest*)和社会性(*socialaffectivity*),认为即使是社会性的人也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马歇尔承接了边沁关于“快乐与痛苦”的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个体对最大幸福或最小痛苦的追求,导致人们基于“极大化原则”的行为。大卫·休谟认为,经济人不仅仅是利润和效用的最大化者,而且也有贪婪和愉快的愿望,也就是说,人性并非纯粹的自然性,还具有社会属性。社会由人们的愿望造就,又决定着人们实现愿望的选择,只有通过私有财产制度和发展自由贸易,不仅使私人生活富裕,还会增加社会财富并给社会带来美德。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也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认为贸易导致分工,分工导致社会进步,分工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贸易的一种人类倾向。这种人类经济

^① [瑞典]T·伯恩斯:《市场与能动主体——市场组织、市场运行与市场动态的社会——经济学》,周长城译,参见《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活动中彼此之间的协作和帮助并非出于仁爱,而是以此满足各自需要,“无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想要的东西吧,刺激起别人的利己心,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同义。”^①换言之,每个人在为自己的私利打算的时候,不能不顾及他人和社会公众的需要,因而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最有利于社会的资本投向和用途。政府政策只要让每个人充分地追求自身最大利益,就会自然而然地合理分配社会资本,就会促进社会公益的实现,社会福利就会大大增加。“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非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伤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②由此,斯密反对政治家干预经济的行为,认为,“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③在他看来,在自由放任的自然状态下,只有凭借“看不见的手”,任其自由,合法竞争,就能使社会财富增加,就会给每个人都能带来利益。必须指出的是,亚当·斯密并不认为人性只有单纯“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们遵循利己原则行为的本性决定了“这些原则使他对他人的好运气有兴趣,并且为之感到必要的幸福,尽管他从中得不到什么,只是乐观其成而已。”^④斯密认为,“同情心”也是人的天性,它不仅限制着人们无节制的

①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14页。

②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页。

③ [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7页。

④ [英]斯密:《道德情操论》,余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利己行为,还孕育出正义和仁爱,养成了节俭、勤奋、谨慎和勇敢等商人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人置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假定经济人掌握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的精确计算和选择能力,以求揭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与增进公共利益的内在联系机制,进而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有机统一。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的论述也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人”特征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中,“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是基本的事实,因为人的行为都与自身需要和利益攸关,所以,马克思才说,“只有利己主义的个人才是现实的人”^①。任何人从事一定活动都是以获取一定利益为目的的,利益能够带来需要的满足,需要满足了人们才感到快乐和幸福。

真正的市场经济一定是道德经济和法制经济,理性经济人的“利己性”行为由于容易导致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出现,因而必须将其纳入道德和法制的约束之下,即使其是有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行为也要服从一定的秩序。早在19世纪初,西斯蒙第就从伦理视角批评亚当·斯密的观点是“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②。德国历史学派的李斯特也指责斯密的学说是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③。杰文斯、门格尔等新历史学派在审视经济人观念时也指出,斯密的经济人是超越于社会和历史之外的“非人格化”的“虚假的人”,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和实现自我价值。赫伯特·西蒙批评传统经济理论的经济人所谓的既具有所处环境的丰富知识,又具有条理化的偏好系统,同时能在若干备选方案中通过精确计算进行选择,以达到自我偏好选择上的最佳状态的“完全理性”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现实中的人都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人,而且需要多种多样,选择的目标自然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也很难确保完全正确,只能依据有限理性原则做出令人满意的决策。制度经济学认为,人们除了物质方面的需要,还有安全、自尊、情感等社会性需要,这就使得人们做出的个人选择不仅仅涉及其内在的效用函数,还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其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页。

②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1页。

③ [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福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4页。

的社会,依赖于与社会上其他人的相互作用。因此,“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关系去理解人的经济行为”^①。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也证明,经济人或理性人事实上都不会为集团的利益采取共同行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导致集体利益最大化。有的时候,出于利己目的的个人行为可能会导致集体的理性结果的自动产生,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的叠加就是社会利益。但有时,不管个人如何精明地追逐个人利益,社会的理性结果也不会自动出现。这时就需要借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引导和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在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们就发现,要使经济人在市场上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离不开适当的制度和法律。大卫·休谟就说:“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取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它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②亚当·斯密也认为,良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能使自利的经济人既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又能促进他人和社会的幸福,同时又能有效控制损人利己的恶劣品质和行径。马歇尔虽然也以“经济人理念”作为其经济理论基础,但他同时也特别强调,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理性特征的重要体现就是谋利行为必须置于规范和制度约束之下,“即使生活中纯粹的营业关系也是讲诚实与信用的”^③。贝克尔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与文化结构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认为,“在适宜的法律和制度中间,分散的谋取私利的个人会产生一种自发的秩序,一种分配结果的模式,它不是任何人选择的,但是它可以合适地归类为能反映参加者的价值最大化的秩序。这些价值是什么,完全由过程本身来规定。因此,个人的价值不是存在于规定它们的过程之外,也不是独立于这个过程。从

① 参见袁祖社《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公共理性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0~421页。

② [英]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衡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9页。

③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